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2.02.006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探要

陈思晗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韩柳文研究法》一书,寄托了林纾为古文保存精华的理想,体现了他在文法与鉴赏两大版块突出的理论成就。文法论,是古文创作的技法理论;立意上,崇尚意在笔先、忌露贵掩;结构上,追求关合照应,制局有法;用字上,讲究锻炼字眼,因字见义。鉴赏论,是古文阅读与批评理论,主要表现为对揣摩创作心理和“博观”、对比等鉴赏方法的运用。《韩柳文研究法》是林纾古文理论的实践,问世后也备受关注,梳理其中文学思想,于文学写作、文学欣赏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古文;文法;文学鉴赏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0)02-0133-06

A probe into Lin Shu's Research Method on Han Yu and Liu Zongyuan's Works

CHEN Si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Methods on Han Yu and Liu Zongyuan's Works expresses Lin Shu's ideal of conserving the essence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embodies his outstanding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writing technique and literary appreciation. Technique theory is the theory on ancient prose writing technique,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which lies in the conception, the structure, the sentence-making, the diction and so on. The conception must be formed before writing, with implicitness advocated; the structure should be well organized, with foreshadowing and echoing; the words must be carefully chosen, with the meaning easily understood. The appreciation theory is the theory for reading and evaluating classical prose, mainly involving the deduction of writer's creative psychology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such evaluation methods as "a wide view", contrast and others. Research Methods on Han Yu and Liu Zongyuan's Works is the practice of Lin Shu's classical prose theory, which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fter being published. To comb its implied literary thought has great enlightening effects for literary writing and literary appreciation.

Keywords: Lin Shu; Research Methods on Han Yu and Liu Zongyuan's Works; classical prose; writing technique; literary appreciation

晚近时期,林纾用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古文——翻译了百馀部域外小说。康有为曾感叹:“译才并世数严林。”^[1]林纾在翻译上的成就与严复比肩,二人为中国文学和思想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翻译家尚不是林纾的本来面目,他真正竭尽一生钻研与奉献的是在古文领域。翻译与引介外国文学,让他成为新文学的不

桃之祖;研习与讲授古文理论,又使他名副其实地当上了旧文学的押阵大将。新文化运动中,林纾深感古文即将走向衰落,遂致力于编辑古文选本,撰述古文理论,以期“力延古文之一线”。林纾关于古文创作与鉴赏的理论专著现存三种:《春觉斋论文》《文微》《韩柳文研究法》。另外,其古文思想还散见于古文选本序跋、译著序跋等文章之

收稿日期: 2019-08-28

作者简介: 陈思晗(1996—),男,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尚未得到很好地整理。

与《春觉斋论文》《文微》的系统性、理论性不同,《韩柳文研究法》是林纾对韩愈、柳宗元选文的逐篇品评,更侧重于鉴赏。由于体例的限制,《韩柳文研究法》中林纾的古文思想不够集中,因而很少受研究者重视。学者研究林纾古文理论时,往往以《春觉斋论文》为主体,以《韩柳文研究法》为参考和佐证。笔者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韩柳文研究法》的价值。马其昶在《韩柳文研究法序》中说:“世之小夫,有一得辄秘以自矜,而先生独举其平生辛苦以获有者,倾困竭廪,唯恐其言之不尽。后生得此,其知所津逮矣。”^[1]可见此书之撰写,旨在帮助“后生”一窥古文门径。基于此,本文拟以《韩柳文研究法》的文本为核心,以《春觉斋论文》和其他散见杂出的理论观点为参考,探讨《韩柳文研究法》的撰写宗旨,整理出林纾在古文创作、古文鉴赏方面的理论成果,希以明其“裨益后学”的价值。

一、《韩柳文研究法》的创作背景

林纾撰写《韩柳文研究法》,是源于他对古文命运的忧虑。20世纪初期,在梁启超“报章体”、章太炎“魏晋派”与陈独秀、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后冲击之下,古文日益式微。他曾在一篇赠序中写道:

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夫所贵擷经籍之腴,乃所以佐吾文,非专恃多书,即谓之入古,炫俗眼而噤读者之口也。而今之狂谬巨子,趣怪走奇,填砌传记,若缩板榴土,务取其杳且夥者以为能,则宜乎讲意境、守义法者之益不见直也。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趋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闇然而燿,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今同学诸君子,皆彬彬能文者。乱余复得聚首,然人人皆悉心以古自励。意所谓中华数千

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闇然而燿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方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临别,郑重申之以文。余虽笃老,尚欲与诸君共勉之。^[2]

此序写于1913年。在林纾看来,威胁古文传统的有两种势力:一为趣怪走奇的“狂谬巨子”,即章太炎为首的魏晋文派;一为“欧风东渐”,即林纾后来在《〈古文辞类纂〉选本·序》里抨击的“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的“报馆文字”^[3],也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报章体”。这两种文风都是对古文正统的挑战,它们从内部打破了古文的艺术追求。此时的古文只是一定程度上“失真”而已,便已令林纾忧心忡忡,担心它“一旦闇然而燿”。他对古文情感可见一斑。其实真正给古文以毁灭性打击的,是新文化运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明确提出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主张。胡适把文言定性为“死文字”,把以文言文为主体的旧文学称为“死文学”,公开宣布文言已死并呼吁为之“发丧”。^[4]紧随其后,钱玄同又发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论调;陈独秀则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战斗姿态“推倒古典文学”,甚至将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姚鼐在内的著名古文家列为“十八妖魔”。这些无疑都戳痛了林纾脆弱的神经。作为回应,他在《大公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文中,林纾同新派商量道:“马班韩柳亦自有不宜废者……夫班马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5]林纾指出,古文固然是不切时用的死文字,但它仍可以作为一种艺术保留在中国文化里,不应被赶尽杀绝;并且,古文是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的载体,骤然废弃,必然会威胁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为了“力延古文之一线”,林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身为范,进行古文创作;招生授业,传授古文精要;精评细批,编辑古文选本;潜心涵咏,撰述古文理论。他以对传统的热爱和忠贞,做着他自己不朽的事业,直至生命尽头。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参与“围攻”他的周作人回忆起这位老人,也

感叹道:“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6]

《韩柳文研究法》是林纾“保种”事业的成果之一,寄托了林纾为古文保存一线生机、同时也是为中国文化保存一线生机的理想。因此,至少在林纾自己看来,书中所选篇目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使人窥一斑而见全豹,并从中领悟到研习古文的法门。全书选韩文凡67篇、柳文72篇,不附原文,不设章节,只由林纾的逐篇评析组成。书名“研究法”,其实并无抽象、概括的理论,只是他阅读鉴赏的实践而已。笔者认为,细心玩味此书,应当可以领会到两个“法”:其一,能直接从表面感知的,古文之读法;其二,需要读者深加体会的,文章之作法。读法与作法之间,主要蕴含着林纾文法论、鉴赏论两个版块的古文思想,下面分而述之。

二、文法论:古文创作的技法

古文家讲究“文以载道”,但于文道两端,一般而言都不会有所偏废。古文家区别于道学家,就是因为他们在丰富、周密的文学创作技法上更有追求。明代以后,统治者严厉的思想钳制使得古文家在“道”的层面上难以施展,他们遂将更多的智慧投入到“文”上面去,于是古文创作的技法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林纾作为公推的“古文殿军”,他在论文时更是戒律森严、讲究繁多。试看其《春觉斋论文》的篇目——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法、用字四法,足见其古文理论系统缜密,从选字造句到谋篇布局、语言风格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林纾的诸多讲究,在《韩柳文研究法》中主要表现于立意、布局、用字三个方面。

(一)立意:意在笔先,忌露贵掩

立意,是下笔成文之前的思维活动。王葆心在林纾遗著《文微》的序里说:“兹编语文,其言千百,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有以立乎为文之先而已。”^[7]中国传统的作文理论,讲究“成竹在胸”“意在笔先”,注重下笔前的构思。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提到:“盖有理之文,始能纵横如意。若文无把柄,一力搬演,虽引用弘富,究无著也。”^{[8]75}这里的“理”字,固然可以当作“文以载道”的“道”字,强调古文在思想内容上要醇正、严净。但笔者以为把“理”字当作“纹理”“条理”的

“理”也未尝不可,因为他在下句用了“把柄”一词。这句话是说只有构思清晰有条理,下笔才能纵横如意、收放自如,若是构思里没个安排,行文信笔搬演、罗列材料,那样看上去好像很弘富,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这足见立意的重要性。立意之作用,在《韩柳文研究法》中体现为两点。其一,有助于文章形式上的布局、造句和用字的推敲。如评柳宗元“永州八记”之一的《袁家渴记》:“于水石容态之外,兼写草木。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不能谓其漫记山水也。”^{[8]120}所谓“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即是要在构思中理清文章主次,这样在写作时才能收放自如,不至于下笔不知检束。只有在立意中解决思维混乱的问题,才能在下笔时前后提紧、彼此照应。其二,重视立意,有助于文章出新出彩。如评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后说:“枯窘题能展拓如是,非大家莫能跂也。”^{[8]114}替长官作应酬文字很容易沾染歌功颂德的俗气,而柳宗元却能在这类“枯窘”题目上铺成锦绣,被林纾赞为大家之力,其实就是在立意上胜出一筹。立意新颖,思维不拘泥于陈式,方能将普通题目写得出彩。

我们还应注意立意“显”与“隐”的优劣问题。林纾在《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气势》中说韩愈“能敛气而蓄势”^{[9]77},又在《论文十六忌》第一节明确指出:“文字本贵雄直,亦贵直率。鄙言以直率为忌。”^{[9]89}他认为,文非不可直率,但一味直率、刚劲,文字便容易流于浮浅,尤其初学者好犯此病。立意还是要以委婉、迂曲、内敛、含蓄为尚。《韩柳文研究法》里这样的例子就很多,如评韩愈《上宰相书》三篇。韩愈当时年轻且求仕心切,给宰相上书自然有年轻人的气盛和直露。对此,林纾稍置微词,说他“第一书,屡引经义,行文微病繁琐”“文字稍纵,不如晚年之凝敛”。^{[8]15}立意凝敛的典范是什么呢?林纾借用苏洵给韩愈古文的评语——“遏抑蔽掩,不使自露”。不但能遮蔽、掩藏,同时还要能做到不“因蔽而晦、累掩而涩”,且“于蔽掩中有渊然之光、苍然之色”,林纾把这推为韩愈的绝技。^{[8]1-2}

(二)制局:关合照应,制局有法

林纾论古文,将章法称为“制局”。如他在总评韩愈赠序文时说:“不惟造句宜敛,即制局亦宜变。”制局法则,即文章布局时所遵循的规则与方法,它是作者创作时对文章结构的安排。林纾对

于“制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用笔技法上,《春觉斋论文·用笔八则》中分述了起笔、伏笔、顿笔、顶笔、插笔、省笔、绕笔、收笔八种笔法。《韩柳文研究法》一书中充分实践了其理论,评析了不同笔法、不同布局的文章效果。如评《原道》时提到:“理足于中,造语复衷之法律”“须知文之不乱,恃其有法,始不乱也”。^{[8]3}并以黄庭坚评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为例,“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揭示了法度与文章逻辑调理之关系。论说文原以阐明道理为主,因而其笔法不宜曲折迂回,但以条理清晰为要。又如评《送齐皞下第序》:“篇法、字法、笔法如神龙变化,东云出鳞,西云露爪,不可方物”“通篇关合照应,无一处松懈,所以为佳”。评《上留守郑公启》,林纾认为“进退作止,尤步步有法”,并细致分析了文章布局与文章气脉的流转:“劈头便言……已有千觔力量”“其下……真怏爽好男子语”;气盛之极时,“惟一味直率,又近胁制,因复为和婉之词”;又一转,“神色又复毅然”,真是“始终不屈”。^{[8]19}经过林纾一番评点,韩愈声气面貌已然跃然纸上了。这都是布局精妙的例证。

苏洵说韩愈文章能“遏抑蔽掩,不使自露”,他究竟是如何“蔽掩”的呢?林纾也通过分析制局,揭窳其妙。试举评《送浮屠文畅师序》一例。韩愈“当面指斥佛教为夷狄禽兽,而文畅通文字却不以为忤”,林纾通过梳理筋脉为我们找到了答案。

韩文:民之初生,固若夷狄禽兽然。

林评:浑沦说话,不辨儒佛。

韩文: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册,中国之人世守之。

林评:言下分出圣人立教,于是禽兽夷狄与人始分形而立。

韩文:今浮屠者,孰为而传之邪?

林评:此图穷匕见,逼人甚矣。而顶笔却推开浮屠,但论禽兽。

韩文:夫鸟俛而啄,仰而四顾;夫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脱焉。弱之肉,强之食,

林评:禽兽不知道,故亦罹害,人知道,故获安居而粒食。

韩文:今我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

林评:此时仍引浮屠同为人类,见得前此“禽兽”二字不是骂他。

韩文: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林评:“知其所自”,即是醒他溯源于圣人。若不知所自,仍禽兽耳。……累擒累纵,一毫不肯放松,然后明出正告之意,仍不失儒者身份。令人百读不厌。^{[8]29-30}

所谓“蔽掩”,就是内敛其意,含蓄道出。林纾说“蔽掩,昌黎之长技也。不善学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涩”^{[8]1-2},可谓的评。韩愈制局,往往能在其将露处顿收、将晦处稍放,又恰到好处,无迹可寻,此非熔裁排布之力过人者不能学。

(三)用字:锻炼字眼,因字见义

林纾品评古文,一字不肯放过,注意字眼,且善于通过字眼变化来辨析文气、梳理文脉,从一字之中揣摩全篇意蕴。例如他评韩愈《画记》:

本文初无他奇,其在两用‘凡’字,一用‘皆’字,实庸手所万不能到。入手叙人,其次叙马,又次叙杂畜器物。若无所收束,直是一卷账本,何名为记?文合以上之人马,最之曰‘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夫人有事也,马属于人,尚有何事?乃以‘牵’‘涉’‘翹’‘顾’‘鸣’‘寝’诸态为马之事,最之曰‘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文心之妙,能举不相偶之事对举成偶,真匪夷所思。惟人马之外尚有杂畜及兵仗之属,此不可‘凡’者也,乃总束之曰‘皆曲极其妙’,归入画工好处,即为记中之结束。^{[8]11}

两“凡”字,一“皆”字,足将一潭死水点活,使原本写成流水账的文字顿时灵动起来,令人不得不叹服韩愈的笔力,也不得不叹服林纾的眼力!点评之后,林纾强调:“学文者当从此处著眼,方有把握。若但学其字法句法,殊皮毛耳,胡曰善学?”可见他对此法的重视。再如他评《答窦秀才

书》的用字：“一面说朝廷求贤，一面说当道皆良有司。然‘爵位’上用一‘钩’字，则朝廷之‘求贤’可知，良有司之‘衡才’又可知。褒词与贬词，分作两概用法，使读书者解悟其用意，此巧于用‘扼字法’也。”^{[8]16-17}此篇为韩愈在贬谪其间给一个秀才写的信，所评论部分，用以表扬他虚心向学，顺带给朝廷唱一句“赞歌”。而林纾抠出一“钩”字，揭露出韩愈酸味十足，似褒实贬，文意登时明朗。又如《送董邵南序》，韩愈送董邵南出仕河北，当时河北政权归藩镇而不归中央，董生一去，其实是“从贼”的悖逆行为。可他又很欣赏董生，于是满怀情绪，欲言又止：“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10]林纾点出“古”“今”二字相对照，说他“外面是褒词，内中是贬词”。^{[8]28}韩愈性格、感情之复杂，如如可见。

林纾所评点的字，大都是作者集中文思的关键所在，为全篇之“眼目”。这足见他批评眼光的敏锐。韩愈说“文从字顺各识职”，文从字顺，这一要求好像谁都能做到，其实不然。所难为的，就是“识职”，即用字能道得其出处，并能使安得其去处，用此字便称此字之职。后学虽不能至，但阅读和创作时能做到处处留心，也可领悟林纾所传“法门”了。

张俊才先生在《林纾古文理论述评》中说，林纾对“法”的过分讲求“使得古文在形式上更加保守、板滞和凝固，其不适应近代社会的要求是显而易见的”，“是末代桐城派古文弊端丛生，更加朽败的一个标志”^[11]。对此笔者不敢认同。其一，林纾在《论古文之不宜废》里已经承认了古文这一文体已经“不能切于时用”，他也在与新派的论争中赞同了白话。那么，无论讲不讲“法”、讲得细不细，都不能再成为其不实用之原由。况且就林纾自己的创作而言，其“切时用”、针砭时弊的作品大多是白话写成的，比如《闽中新乐府》和进入民国后的时政歌谣，这足见林纾本人并未把“古文”和“实用”联系在一起。其二，林纾呼吁保存古文，亦只是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之一门类。是“艺术”，自然该有它的艺术讲求，而不能用实不实用来衡量。其三，不授人规矩，则不能成方圆。大凡为人教授，都要以较基础的、浅层的、具象的、可学的理论引导初学者入门，至于能否由表入里、去粗取精，那是学习者自己的造化。林纾的理论撰述，也应如此定性，不能用这个

来评判其古文成就。如林纾在评韩愈《祭十二郎文》时，他所有繁密的“讲求”都失效了，只说“错错杂杂，说来俱成文理。吾亦不能绳以文字之法分为段落，但觉一片哀音”。可见上乘文章自是不受各种“法度”束缚的。

三、鉴赏论：古文阅读与欣赏的实践

《韩柳文研究法》是由林纾对韩柳选文的逐篇点评所组成的，自然它更侧重于古文鉴赏。前文述及林纾撰写此书目的在于从“读法”与“作法”两个方面启发后学，但其实原书提到“作法”很少，所整合的“作法”多从“读法”中来。一百年前林纾的忧虑早已变成了现实，古文业已退出了文学创作的舞台，但欣慰的是，古文阅读与欣赏仍能保留在我们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之中。林纾的古文鉴赏论及其实践，对当前读者仍有帮助。

（一）“知人论世”——创作心理的揣摩

“知人论世”是我国理论传统之一。如果不了解特定文学环境中文学观念的传统，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作者创作心理、品味创作技巧，文学欣赏便只会停留于表面，不能够深入。中国古典文学注重含蓄美、中和美，自风骚以降，隐秘性、象征性是文学的突出特色。虽然司马迁讲“发愤著书”，韩愈说“不平则鸣”，但儒家又宣扬喜怒哀乐要“发而皆中节”，所以作家对感情的抒发一般都会有所约束。因此，古典文学多了一些朦胧感，令我们不易通过文本揣摩作者的创作心理。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在评析作品时往往会用大篇幅去解析文句，知人论世，使读者准确把握作者的文意，深度了解文章。

如韩愈《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一文，被林纾推为墓铭类作品中的“最奇者”。所“奇”何在？原来墓志与铭为应用文体，以记叙为主要手法，以概括墓主生平、歌颂墓主品德为目的。《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中不但有很多议论文字，且论调富含贬义色彩。到底是何原因使韩愈一反“谀墓”作风，在别人的墓志中大发议论，严厉批评墓主的失当行为呢？林纾分析，墓主李君是服丹砂而死，而韩愈自己也因丹砂威胁性命。所以，林纾揣测其创作心理道：“此文之作，适以自箴耶？或作后而仍不改耶？则不可知矣。”^{[8]52}历史实像究竟如何先不说，照此“索隐法”读下去，至少增添了许多阅读趣味。又如，赠序这种文体，主要用于

表达对远行朋友的祝福与鼓励。而韩愈《送董邵南序》却迂回婉转,欲言又止,其情感与态度令人难以捉摸。对此,林纾先钩沉历史,分析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的政治背景,再以《嗟哉董生行》诗为参照,说明韩与董的交际关系。林纾指出:“《嗟哉董生行》极言其孝慈感召,至哺鸡乳狗,以翼来覆云云。爱董生至矣。乃以不得志之故,郁郁从贼,在理原不宜有序,然既有前诗之褒美,则赠序亦不能不加匡正。若对董生当面骂贼,则文章实无此体。”^{[8]28}情感复杂,不能直率,所以行文多“蔽掩”。读者若草草读过,便不能玩味其中深意。再如前面提到的《送浮屠文畅师序》《送廖道士序》等,读者若不了解韩愈“力辟佛老”的志向,自然也无法体会文中隐含的调侃与讽刺。待林纾从“辟佛老”出发,分析文章制局,如解全牛,将韩愈之心剖解于读者目前,我们才真觉韩文百读不厌。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在评析作品时,不惜用大量笔墨去分析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作者的生平特征。这样,不仅能使读者准确地把握文意,而且还能在其基础上去品味优秀作品的魅力。

(二)“博观衡鉴”——比较批评的运用

“博观衡鉴”是林纾在《文微》提到的一个观点,他要求鉴赏者要增广见闻,扩展知识面,尽可能多维度、多视角地感知作品。这在《韩柳文研究法》中主要体现为跨学科鉴赏和纵横比对鉴赏两个方面。

1. 跨学科的鉴赏方法

林纾深谙绘画技艺,在文学赏析中能援绘画的构图理论以入文学。例如评论韩愈《送杨少尹巨源序》,他在分析韩愈文章布局时说:“大类管夫人之画竹石,丛竹在前,一石独历落而远。此序事之前后际,部署大有功夫。”将文字的好处用视觉传达给读者,可谓独到。人都说王摩诘“诗中有画”,原来韩昌黎文中也是有画的。又如评柳宗元《游黄溪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8]117}荆、关、董、巨,是五代十国时期著名的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林纾以画家的“不能肖”来推许文学家的妙笔生花,深得文学鉴赏中的三昧。

2. 纵横比对的鉴赏法

林纾在鉴赏过程中,最擅对比,以一篇为中心,既可纵向分析同类体裁、同类题材在不同时期的承变,也可横向比较同一人的不同作品或不同

作家的相似作品。

纵向对比,如拿《进学解》与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卢仝《月蚀诗》比较,最后看出韩愈的优胜处:“昌黎所长在浓淡疏密相间错而成文……其骤也,若盲风骤雨。其夷也,若远水平沙。文不过一问一答,,而啼笑横生、庄谐间作。文心之狡狴,叹观止矣。”^{[8]7-8}又如将《送穷文》与扬雄《逐贫赋》对比赏析,看其如何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新变:“盖本于扬子云《逐贫赋》,扬子《逐贫》,但一问一答。《送穷文》,则再问再答。文气似厚,而所以描写穷之真相,亦较扬文为深刻。真神技也……(扬)语气凡近,似小家子。而昌黎则定其罪状,曰‘五穷’,言衣食燕乐处寡,叙愤时嫉俗处多。”这是韩愈的创新。“扬雄结言‘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逐不去,与我游息。’则安贫之言也。昌黎之‘烧车与船,延之上座’亦本此意。总之文字不摹仿则已,一践前人旧步,虽具倚天拔地之才,终不能摆脱范围。但能于此句机轴,少为变易而已。”^{[8]54}这是韩愈继承但不能突破的地方。

横向对比,如《马说》与《获麟解》两篇,本不是相联文字,但林纾偏能择其文意相近处逐句比较,揣摩其创作心理:“皆韩子自方之辞也。说马语壮,言外尚有希求;解麟词悲,心中别无馀望。两篇均重在‘知’字。”“古有知马之伯乐,无知麟之伯乐。且马有群,伯乐不过于群中别为千里之马。麟无群,可以不待别而知为麟。至于不待别而知者,而仍不知,则麟之遇蹇矣。此昌黎所由用以自方也。”^{[8]5}“而昌黎自命,则不亚于麟与千里马。千里马不幸遇奴隶,麟不幸遇俗物,斥为不祥,然出皆非时。故有千里马之能,抹煞之曰‘无马’;有盖代之祥,抹煞之曰‘不祥’。语语牢骚,却语语占身份,是昌黎长技。”^{[8]6}句句鞭辟入里。

四、结语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扣上了“顽固”“反动”的帽子,这使他多年遭受不公对待,但可喜的是近年来他被重新评估,得到肯定。他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一为对古文的赤诚,二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林纾在新旧论战中表现出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著、坚定,是他对以传统文化为生命信仰的诠释。他也确有超乎常人的艺术感知力,品鉴古文,尤其善于从幽微处出洞见,显示了他的才性

(下转第148页)